

核 心 概 念 篇

变异语用学

VARIATIONAL PRAGMATICS

变异语用学 (variational pragmatics) 关注的是由于地域和社会空间变化而引发的语用变异问题 (Schneider & Barron, 2008), 主要考察同一语言内部由于地域、性别、年龄、民族身份以及社会经济阶层等宏观社会因素差异而引起的语言使用上的变化 (Barron, 2017; Barron & Schneider, 2009; Schneider, 2010, 2021; Schneider & Barron, 2008)。当然, 变异语用学中涉及的宏观社会因素并不局限于以上五个方面, 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如还可以包括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城-乡、虚拟-现实空间等因素。换言之, 由于这些因素差异而引起语言使用上的变化问题同样可以纳入变异语用学研究的范畴。

❧ 学科定位

就学科定位来看, 变异语用学隶属于语用学 (pragmatics), 是语用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变异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历史语用学 (historical pragmatics)、对比语用学 (contrastive pragmatics) 和跨文化语用学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有密切联系, 阐明变异语用学与这些研究领域之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其学科内涵。

首先是变异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之联系。施奈德和巴伦 (Schneider & Barron, 2008) 指出, 变异语用学的发生是方言学和语用学结合的结果, 因为方言学研究中对话用维度缺乏关注, 而语用学研究中对话域变化因素缺乏考察。施奈德 (Schneider, 2010: 239) 进一步明确了方言学的内涵, 即方言学是一个既包括地理方言学也包括城市方言学的广义概念, 同时还包括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变异的所有层面, 因此变异语用学可

视为“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界面研究领域”。

其次是变异语用学与历史语用学之共性与差异。它们的共性在于，二者均关注同一语言内部的语用变化问题；差异在于，变异语用学主要关注共时层面的语用变化问题，而历史语用学关注的则是历时层面上的语用变化问题。由于二者的共性特征以及二者发生时间邻近，因此变异语用学可以“看作是历史语用学的孪生学科”（Schneider & Barron, 2008: 1）。

最后是变异语用学与对比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同一语言内部的语用变异问题，而后两者主要关注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言或语言文化之间的语用共性或差异问题（Blum-Kulka et al., 1989; Oleksy, 1989; Pütz & Neff-van, 2008）；联系在于，前者和后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考察异同是变异语用学与对比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的共性特征。同时，二者在语料收集方法上也均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变异语用学分析的语言形式、言语行为（speech act）、会话互动、话题、话语组织等五个具体分析层面也是对比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研究领域的考察重点，特别是言语行为层面，在三个研究领域中都颇受关注。

03 发展历程

变异语用学已成为语用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与变异语用学相关的研究，但“variational pragmatics”（视情况可以翻译为变异语用学或变异语用现象）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是在 2005 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巴伦和施奈德于 2005 年 7 月 10—15 日在意大利举办的第 9 届国际

语用学大会上组织了一个专题论坛, 主题为“变异语用学: 跨文化路径”(Variational Pragmatics: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二是巴伦在 2005 年 *System* 第 3 期上发表了题为《外语课堂中的变异语用现象》(“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的文章。这一术语的提出, 对变异语用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 在巴伦和施奈德的积极推动下, 变异语用学发展非常迅速,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已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议题。其中有两部研究成果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 2008 年由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施奈德和巴伦主编的《变异语用学: 聚焦多中心语言的地域变体》(*Variational Pragmatics: A Focus on Regional Varieties in Pluricentric Languages*)。该论文集包括 11 篇文章, 第 1 篇是对变异语用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系统介绍, 其余 10 篇分别考察了英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法语等五种语言的地域变化引起的语用变异问题。这部论文集集中的成果对变异语用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 2020 年由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费利克斯-布拉斯德菲尔(Félix-Brasdefer)和普拉森希尔(Placencia)主编的《西班牙语世界服务交际中的语用变异》(*Pragmatic Variation in Service Encounter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该论文集聚焦西班牙语服务交际互动中的语用变异, 包括三大部分 14 篇文章: 第一部分 10 篇文章分别考察了以地域、性别、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四个宏观社会因素为变量的西班牙语服务交际中的言语行为、语言形式、会话互动等; 第二部分 2 篇文章涉及微观社会因素和情景因素对服务交际互动的交互影响; 第三大部分 2 篇文章聚焦服务交际互动中变异语用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该论文集呈现的新成果丰富了变异语用学研究的交际体裁、研究内容和议题, 对推进变异语用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值得关注的是,汉语语用变异也具有较长的发展历程,虽然“变异语用学”这一术语直至2012年才由任育新和陈新仁引介至国内,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出现了与语用变异相关的研究,如何自然等(1999)发表的《香港与内地社会媒体语用变异分析》,它应该是国内最早使用“语用变异”一词的文献。近年来,国际和国内期刊均有关于汉语的变异语用学研究成果发表(如陈新仁、李捷,2019;任伟,2018;任育新,2019;Liu et al., 2021; Ren, 2015)。

研究内容

以宏观社会因素为基础变量、以不同多中心语言为分析对象、以五个具体层面为考察重点,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变异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前文已对宏观社会因素作了说明,主要包括地域、性别、年龄、民族身份、社会经济阶层等,还可以包括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城-乡、虚拟-现实空间等因素。就变异语用学涉及的多中心语言来看,主要有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德语、法语、荷兰语、汉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变异语用学分析的五个具体层面是(Barron & Schneider, 2009; Schneider & Barron, 2008):

1)形式层面:主要聚焦具体的语言形式,如话语/语用标记语、模糊限制语(hedge)、强化语、附加疑问语等。

2)行为层面:主要聚焦言语行为(如请求、致谢、致歉、建议、赞扬、邀请等),如依据话语直接程度和礼貌程度来考察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的修饰,言语行为的功能以及言语行为的语言实现方式等。

3)互动层面:主要聚焦话语序列模式,如相邻对(adjacency pair)、

会话序列、开始会话和结束会话，同时也可拓展到会话过程中的身份建构、礼貌及不礼貌的协商等。

4) 话题层面：主要关注话语的内容和社会话题，如在互动中可以选择哪些话题，如何引入话题，如何在交际互动中拓展、改变以及终止相关话题等；哪些话题适合闲聊，哪些话题属于禁忌话题等。

5) 组织层面：主要关注话轮转换，如如何占有发话权，如何分配发话权，以及会话过程中的停顿、重叠、打断等。

变异语用学研究就是以—个或多个宏观因素为变量，以某—种多中心语言为分析对象，聚焦其中—个层面的某—类或多类语言现象[如语言形式层面上的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言语行为层面的“请求”言语行为或者会话互动层面的“结束会话”等]，开展系统的对比分析。总体来看，现有关于变异语用学的研究以关注地域差异引发的语言使用上的变化居多，而对性别、年龄、民族身份、社会经济阶层等宏观社会因素的关注较少，对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城—乡、虚拟—现实空间等因素差异引发的语用变异研究更少。另外，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在—个变量层面的对比，即地域、性别、年龄或社会阶层差异等，基于多变量的对比研究还比较欠缺。从涉及的多中心语言来看，主要是英语，其次是西班牙语，对其他多中心语言的关注还不足。就五个具体分析层面来看，以言语行为研究为主，其次是语言形式层面，对其他三个层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

研究方 法

变异语用学研究遵循—定的方法论原则，即实证原则、对比原则以

及数据的可比性原则。施奈德（Schneider, 2010: 252）指出，实证原则是“变异语用学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变异语用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实证研究，而不是内省式的研究。另外，对比原则也是变异语用学研究的根本原则，任育新和陈新仁（2012: 193）指出，“变异语用学从根本上是对比性的，对比研究至关重要”。对比原则强调，考察某一语言中某一类现象需要同与之相对应的语言变体中的此类现象进行比较。例如，如果要考察新西兰英语的致谢言语行为语用变异情况，就需要与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或加拿大英语等其他地域变体中的致谢言语行为进行比较，反之亦然。最后，数据的可比性原则是对对比原则进行制约的原则，该原则强调，变异语用学研究中进行对比的数据或语料之间一定要具有可比性。例如，施奈德（Schneider, 2012）在考察跨地域英语使用得体性的语用变异时，其中一个实验研究通过话语完型问卷收集了语料，语料收集自 90 名英语本族语者，其中 30 名来自英格兰、30 名来自爱尔兰、30 名来自美国，所有的受访者都是青少年女性，年龄在 13—18 岁之间，平均年龄 14.8 岁。基于这些语料，他对比了来自英格兰、爱尔兰、美国三组受访者分别在打招呼、搭话、表明身份三类行为上的异同。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语料的可对比性原则，但如果打招呼或者搭话行为的语料来自 30 名英格兰青少年女性和 30 名爱尔兰老年男性，那么其语料就不具有可比性。

此外，变异语用学研究中，既有通过话语完型问卷或角色扮演（role play）等收集的（准）实验数据，也有通过录音收集的自然语料，还有源自己有语料库的语料。这些数据 and 语料各有自己的优势，但在具体研究中并无优劣之分，数据收集和语料选取都要以实现研究目标为主要标准。当然，同一研究中可以选取多种数据或语料，进而形成不同类型语料或数据之间的优势互补，协同服务于研究目标的实现。

03 未来展望

1) 丰富研究内容。首先,未来研究需要拓宽变异语用学研究中宏观社会因素的范围,除了关注地域、性别、年龄、民族身份、社会阶层/经济地位五个因素之外,还可以关注包括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城-乡、虚拟-现实空间等因素,以丰富变异语用学宏观社会因素的内涵;同时,需要加强对目前关注不够的宏观社会因素变量的考察。其次,需要进一步加强会话互动、话题、话语组织等目前研究中关注还不够的分析层面。最后,需要加强对关注不足的多中心语言的考察。任育新(2022: 21)指出,“对国内学者而言,可以更多地关注汉语的语用变异问题”。同时,变异语用学还需要顺应言语交际的新现象,特别是关注网络及新媒体交际中新的言语交际现象及交际模式。

2) 探索研究方法。相对于变异语用学而言,对比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具有相对较长的发展历程,在研究方法上更为成熟,因此变异语用学可以借鉴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另外,还需探索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交叉应用以及多种方法的协同混合使用,以更深入、全面地揭示语用变异的特征。

3) 拓宽话语体裁。从现有研究涉及的口语和书面语体裁来看,对书面语中语用变异的研究非常缺乏,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书面语中的语用变异情况(Schneider, 2010)。另外,现有研究中涉及的交际体裁多以日常交际为主,对机构互动中语用变异情况的关注比较欠缺。因此,可以从变异语用学视角探讨学术互动、医患会话、媒体话语、工作场所话语等各类机构互动话语中的语用变异情况(任育新, 2020, 2022)。

4) 强化视角特征。变异语用学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同时变异语用学还为语言使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变异语用学强调的是“相同语言作为第一语言的各种变体间及跨变体的语用变化”(Barron & Schneider, 2009: 426),但变异语用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可以借之来观察和考察某一种外语作为通用语使用时的语内语用差异。换言之,变异语用学研究可以超出母语为相同语言的语内语用差异,在遵循变异语用学方法论三大基本原则,特别是数据的可对比性原则的前提下,还可以关注通用语的情况,特别是英语作为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的情形。陈新仁等(2021: 84)指出,“从变异语用学视角考察不同地域英语作为通用语时使用异同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陈新仁等. 2021. 语用学新发展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陈新仁, 李捷. 2019. 当代中国礼貌观城乡差异调查与分析. 外语研究, (1): 29-36.
- 何自然, 吴东英, 陈瑞端, 黄子程. 1999. 香港与内地社会媒体语用变异分析. 学术交流, (3): 85-91.
- 任伟. 2018. 汉语请求言语行为的变异语用学研究.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4): 66-75.
- 任育新. 2019. 语用学研究: 变异语用学研究.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6): 1.
- 任育新. 2020. 话语中权势研究的特征、趋势和建议. 现代外语, (2): 272-281.
- 任育新. 2022. 变异语用学——目标、议题与方法.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 15-25.
- 任育新, 陈新仁. 2012. 《变异语用学》介绍. 当代语言学, (2): 190-193.

- Barron, A. 2005.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System*, 33(3): 519–536.
- Barron, A. 2017.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A. Barron, Y. Gu & G. Stee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London: Routledge, 91–104.
- Barron, A. & Schneider, K. P. 2009. Variational pragmatics: Study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factors on language use in interaction.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6(4): 425–442.
- Blum-Kulka, S., House, J. & Kasper, G. (Eds.). 1989.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Norwood: Ablex Pub.
- Liu, W. J., Li, L. & Ren, W. 2021.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requests: The influence of age and social statu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78: 349–362.
- Oleky, W. (Ed.). 1989. *Contrastive Pragmatic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Pütz, M. & Neff-van, A. J. (Eds.). 2008. *Developing Contrastive Pragmatics: Interlanguage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Ren, W. 2015. Sociopragmatic variation in mainland and Taiwan Chinese refusals. In K. Beeching & H. Woodfield (Eds.), *Researching Sociopragmatic Variability. Perspectives from Variational, Interlanguage and Contrastive Pragmatics*.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72–93.
- Schneider, K. P. & Barron, A. 2008. Where pragmatics and dialectology meet: Introducing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K. P. Schneider & A. Barron (Eds.), *Variational Pragmatics: A Focus on Regional Varieties in Pluricentric Languag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32.
- Schneider, K. P. 2010.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M. Fried, J. Östman & J. Verschueren (Eds.), *Variation and Change: Pragmatic Perspectiv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39–267.
- Schneider, K. P. 2021. Variational pragmatics. In M. Haugh, D. Kádár & M.